

文学史研究

民族国家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杨剑龙 陈海英

内容提要：近年来，民族国家概念被广泛运用，许多学者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和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但是，在运用该概念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盲目跟风甚至混淆概念的滥用、误用现象，这引起了我们对如何借鉴拿来西方文艺理论、创建本民族文艺理论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民族国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西方文艺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破了以往绝对政治化的视阈，在引进西方文学观念、文艺理论、批评方法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丰富、生动了起来。近些年来，民族国家成为一个经常被广泛运用的概念，许多学者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民族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应该如何看待以民族国家视角展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利与弊？我们应该如何借鉴和运用外来的概念进行研究？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

在谈论民族国家的概念前，我们有必要甄别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民族国

本文为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项目成果，上海市高校创新团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项目成果。

家这几个概念,梳理它们之间的关联与区别。

民族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①。国家是指“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兼有社会管理的职能”,“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②。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可看出,民族更多偏重于地域、文化及心理认同,是一个文化学、人类学的概念。“文化是民族的特征,民族是文化的载体。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化’实际上是民族性的代称。”^③可以说,民族内涵的最本质、最核心因素是文化;而国家更多偏重于地理、政治和军事,通常来说一个完整的国家必须包含主权、领土和人民三要素,是一个政治学上的概念。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用中国的政治历史证明,中国人说王道是合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就是国家。”^④

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资产阶级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本民族中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对于其他民族采取歧视、压迫政策,并经常制造民族纠纷,破坏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企图以民族斗争掩盖阶级斗争。但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⑤。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民族主义又被称为国家主义,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是这样解释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nationalism)是对国家的高度忠诚,即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或其他团体利益之上。在不同形式的各个国家中,它会以一种独特的进程出现和存在。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近代现象。它起源于民族国家是正直忠诚基本中心的设想——这种设想并不是始终被广泛接受。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有时它与国家结合在一起,有时它在民族、种族或文化社会中兴起。”^⑥民族主义是将本民族利益视为至高无上而歧视、压迫他民族的一种观念或思想。

民族国家则更为复杂,这是一个源自欧洲的概念,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伴而生,是民族和国家相结合的产物,既有民族的内涵,又有国家的内涵,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西方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场悲剧。”^⑦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民族国家被理解为“国家”与“民族”两种要素的结合,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⑧。

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国家形态,民族国家自其诞生之日起,其内涵和外延

就处在不断的争议和发展变化之中。最早民族国家通常被认为出现在16、17世纪的西欧,是指那种摆脱中世纪以来封建割据、教权和王权控制过程中所诞生的现代主权国家,这一过程中,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创立齐头并进,并且基本具备了民族与国家同一的形态,因此被称为“民族国家”^⑨。可以说,这时候的民族国家是指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⑩,是“拥有同一文化、同一语言等因素的民众所建立的独立国家”^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建立起了第一批此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伴随着西欧民族国家影响的日渐扩大,作为欧洲概念的“民族国家”逐渐普世化^⑫,民族国家成为继英国、法国之后向全世界蔓延的一种社会形态。美洲、中欧、东欧、亚洲、非洲等地区纷纷效仿,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为目标,使得民族国家逐渐成为自近代以来最基本的国家形态。但是在民族国家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由于各国历史条件的差异,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式和途径都大相径庭,民族国家的形式变得复杂多样,和最早的西欧民族国家相比,多数国家的民族构成显得多元而复杂,随着历史的发展,最初提出的“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形式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只能是一种理想模式。此时再用欧洲狭隘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含义去解释仍“被视为当今世界体系中主权的惟一合法的表达形式”^⑬的民族国家,显然已不合时宜。于是在保留民族国家形式的前提下,改造、丰富其内涵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民族国家概念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且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⑭“从本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⑮,“构成民族国家的本质内容,是国家的统一性和国民文化的同质性,是国民对主权国家的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⑯。“所谓民族国家即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种国家是建立在国家民族认同的基础上的,以暴力作后盾,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主权国家。”^⑰……

基于以上对“民族国家”发展演变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的是:民族国家产生于西欧,是一个相对于传统朝代国家而言的现代国家概念,是当今世界国家体系的基本国家形态,其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在明确的领土范围内由一个或多个民族(民族共同体)为国民主体建立起来的、实行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主权国家。根据民族构成的不同,既包括单一民族国家,也包括多民族国家。狭义的民族国家专指单一民族国家。

综上所述,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为不同内涵的概念,民族是一个文化学意义的概念,国家是一个政治学意义的概念,民族主义是极端强调本

民族利益而歧视压迫他民族的一种观念或思想,民族国家则特指国家形态中的一种,作为一种特定的国家形式,它是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它对外强调国家主权的独立,对内则强调民族共同体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强调民族共同体对国家政治、文化的认同。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活动开始进入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亡国灭种的威胁,促使中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梁启超提出“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⑮。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被提出,并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王朝国家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⑯“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形式,是现代性催生的和赖以存在的政治实体。”^⑰作为现代性追求的重要方面,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贯穿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历史及近代以来特殊的社会现实环境,民族国家这一来自西方的舶来概念在中国的情况显得异常复杂。

二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⑱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而广受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禁锢的消解、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文艺观点、文艺理论蜂拥而入。民族国家理论、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也传入中国。影响较大的要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他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形象形式,18世纪初欧洲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⑲。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日本现代文学实际是现代国家建制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小说’在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而非边缘的存在。‘现代文学’造就了国家机构、血缘、地缘性的纽带绝对无法提供的‘想象的共同体’”^⑳。揭示了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森以鲁迅作品为例,指出了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

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②4}。海外华裔学者刘禾则更直接地提出了“民族国家文学”概念，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尤其是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写作等机制及其运作。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②5}

当这些民族国家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后，民族国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产生了诸多以民族国家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述，民族国家成为流行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概念，成为诸多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研究的视阈与方法。如旷新年的《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②6}一文，从民族国家想象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之关系，指出：民族国家意识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现代文学所隐含的一个最基本的想象，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和建构中发生了重要的作用。旷新年认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首先就是要进行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启蒙，从而打破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蒙昧状态。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救亡和启蒙、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救亡不是启蒙的对立，而是启蒙的一个基本内容^{②7}。这一观点“对于过分强调启蒙精神中的个性解放和个人价值的意义，把个人本位认作是现代性的核心，有着明确的补救和纠偏作用”^{②8}。这也对一直以来的“启蒙”与“救亡”对立冲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②9}，从民族国家想象和建构的角度，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文艺政策、倡导的文学运动予以了客观的评价，对被有意、无意忽略或遮蔽的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作了重新阐释，肯定了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有论者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出发，对20年代的国家主义、20年代末的“三民主义文艺”、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40年代初的战国策派等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做出了比较贴近历史的重新评价，如王本朝的《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到“战国策派”》^{③0}。还有论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主潮及小说文体的复兴等问题做出了较为合理的分析论述。

总之，民族国家理论的引入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范式建构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对某些文学现象重新做出理解和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并由此生发出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丰富和推动了现代

文学研究的发展。然而,在运用民族国家理论视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尾随别人的观点亦步亦趋,缺乏自己独立的见解。自刘禾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③①}之后,出现了一些类似的观点。如《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以〈新青年〉为中心》^{③②}《战国策派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时间》^{③③}《对“家”的控诉与传统文化的解构——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文化取向》^{③④}等文章,都基本成为刘禾观点的佐证与补充,有的在阐释中用一言以蔽之的概括掩盖了现代文学史本身的复杂性。近代以来,由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以抵抗西方的殖民侵略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这决定了民族国家话语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为强势的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是惟一的话语形态,因而用“民族国家文学”来简单化地概括多元复杂的现代文学性质,有时显得过于武断甚至失之偏颇。因此,有学者就批评说:“就拿‘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来说,我看它并非本质性的、可以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概念的‘发明人’恐怕也不想这样做。设计某种理论框架以进入文本,并进而统摄文学历史的方法,其弊端的一面是,有意无意遮蔽这一框架难以容纳的文学现象,而在文本分析中又忽略矛盾、差异的异质性。”^{③⑤}

二、缺乏对民族国家概念内涵的把握,滥用、错用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近些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民族国家一词触目可及,似乎任何问题都可与民族国家扯上关系,似乎谁若不用民族国家,就有落伍之嫌疑,于是凡是提到国家或民族时,皆以民族国家取而代之。殊不知民族国家是一个特指的概念,是相对传统王朝国家而言的现代国家形式之一种;也有研究者对中、西方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语境不加区分,简单地将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生搬硬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又有研究者对民族国家概念缺乏深入理解,将该概念宽泛化,简单地将民族、国家等同于民族国家,或又将阶级斗争政治革命等同于民族国家建构,从而使该概念模糊,造成意义的歧变、话语的混乱。

如《论民族国家想象与老舍文学创作》^{③⑥}一文,作者通过对老舍早期至抗战期间的文学作品的分析,说明其作品始终围绕着民族国家的想象。诚然老舍早期的《二马》《猫城记》等作品都表达了老舍对古老民族文化的反思、对中国命运的思考及构建新国家的渴望,但其作品中的新国家是相对于落后衰败的古老中国而言的现代国家,并不是特定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可以说,论文中所说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国家的概念,作者将国家与民族国家混淆等同起来了。《九叶诗派与民族国家想象》^{③⑦}一文,论者从诗歌与政治、革命、国家之关系入手分析论

述九叶诗派的诗论主张,认为九叶诗派在诗歌中建构了民族国家想象。在文中,论者对国家、民族国家不加区分,甚至将二者等同,随意换用。

又如《谈“反正”——对〈白鹿原〉中民族国家想象的思考》,^{③⑧}论者通过对《白鹿原》革命内涵的分析审视,认为小说的主旨是对民族国家出路的思考。熟悉该小说的读者都不难看出,《白鹿原》更多的是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如果说论者不是有意用民族国家替代富有文化意味的民族概念,就是缺乏对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将民族等同于民族国家了。

再如《个体生命审视与民族国家思考的双重表达——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③⑨}一文,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寄寓了作家自身的深刻焦虑和对民族国家的现实关怀,但仔细分析则发现此处的“民族国家”只是相对个体而言的“民族、国家”概念,而非源自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与此类似的表达在《论民族国家与男性自我主体表达——析郁达夫小说的妓女叙述》^{④⑩}也存在,论者认为郁达夫小说的妓女叙述是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和男性现代性性别主体生成缠绕在一起的,很明显作者所指的民族国家也是相对个体而言的“国家、民族”,而不是特定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可以说,将民族、国家等同于民族国家的例子举不胜举,给研究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和混乱。

另外,以民族国家理论来分析“延安文学”、“建国十七年文学”作品中革命、阶级斗争叙事的文章十分常见,论者普遍认为这类文本充满了对新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是“对新生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论证及民族国家精神的塑造”^{④⑪}。此类观点不乏合理性,但也有将阶级斗争、政治革命全部看作是对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的简单化处理倾向,有将民族国家概念宽泛化的倾向。

三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民族国家理论的引入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视野,作为一个现代性范畴,民族国家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有助于我们去发掘文学参与国家建构的合理性及对中国现代文学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被传统主流文学批评所忽视的文学现象的理解和评价,同时该视角与理论的引入也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过于强调政治性到过于强调审美性的极端转变做出了合理的修正,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因而民族国家理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

在运用该术语、理论的过程中,囫囵吞枣式的生搬硬套、不求甚解的赶学术

时髦、甚至混淆概念的误用滥用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民族国家理论在西方也有过争议，民族国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中。其移植到中国后，情况就更为复杂，譬如：中文“民族”一词与之相对应的英文“nation”一词，在意义上就有很大差异，英文中的“nation”除具有生物学、人类学的意义外，更多的是政治学的意义，包含了民族、国家、人民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可与民族国家置换，这与欧洲民族国家民族成分单一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而中文的“民族”一词虽引自西方，但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更多的是沿用我国古代历史上“族类”^{④2}的内涵，偏重的是人类学、文化学的意义，与国家是两个分别独立的概念，更不能与民族国家替换，这自然是和中国的多民族历史分不开的。正如萨义德的“理论旅行”^{④3}学说所说的那样，任何理论都有其自身的问题背景及理论发展脉络，同一概念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其意义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因此，在对这类概念的运用中，如果不结合特定的语境加以分析，就一味地照搬，势必会产生错位错用，造成某些不良影响。

在近些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运用“民族国家”概念错位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也有不少，比如与“民族国家”有密切关系的“现代性”一词，就如温儒敏先生所说的：“90年代以来，‘现代性’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成为统摄性的概念，无论文化研究还是思想史研究，都乐于采纳这个研究视野。”^{④4}“现代性”在文学研究中俯拾皆是，似乎没有了“现代性”，文学就没有了意义，研究也就没有了价值，于是人人抢着言说“现代性”，甚至造成滥用“现代性”局面，往往对其内涵都没有弄清楚，就仓促地运用，断章取义，似是而非，把原本十分复杂的西方话语简单化处理，更不用说去考虑中国现代化之路与西方之迥异了。可以说，诸如此类的对从西方引进的新理论、新概念不求甚解地运用，已是屡见不鲜了。近年来，“本体论”、“主体意识”、“后现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概念、术语，在中国文坛走马灯似地登台亮相，充斥着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研究，使得我们的研究笼罩在西方话语的巨大影响中。“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踪外国人的理论与批评，忙于学习，把握外国人的新说。”^{④5}“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的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④6}不少学者对这些概念、术语的特定内涵、外延及其背景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一味照搬、生吞活剥、盲目跟风，又导致了文艺理论话语的混乱和病态，“中国文艺学几乎成为了一个吃狼奶长大的畸形儿，它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却始终发出夹杂着外语名词不中不西的话语”^{④7}。

从西方借鉴学术话语是为中国文学研究增添活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重要体现。20世纪初，以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率先介绍、引进、吸纳西方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掀起了学习西方新文艺思想的热潮，打破了中国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的封闭状态，使中国文学开始了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新时期以来掀起的向西方文艺理论学习的热潮，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长期以来附庸于政治的单一话语局面，促使文学批评从单一批评模式向多元批评模式转变。中国文学是在中国的土壤上诞生成长起来的，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来自西方的观念理论未必都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在大量引进西方理论与观念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警惕饥不择食所带来的消化不良，不得不警惕邯郸学步后行路能力的丧失，不得不警惕人云亦云后话语权的丢失。

人们批评我国文艺理论患有严重的“失语症”，文学研究中更倾向于向西方寻找精神资源，呈现出“西方话语中心论”的倾向。面对这样的尴尬，应该如何借鉴“拿来”域外的文学理论和方法？应该如何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概念、理论？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通过对运用民族国家概念展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利与弊的梳理分析，我们提出如下思考：

一、以“拿来主义”精神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精华。面对西方五光十色日新月异的新概念、新理论，全盘西化或者闭关自守都是过于极端的，我们应该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④8}。我们应该有选择地拿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④9}。对来自西方的理论话语，我们不应该一味地追随模仿，也不应该囫囵吞枣地借用、生吞活剥地照搬，而是要深刻认识中西文化历史的异同，在细致深入了解西方理论的内涵与实质后，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精心的研究分析，进行理论的转化与吸收，创建适合中国本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民族国家”就是这样的例子，若简单地搬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就无法解决中国的多民族统一问题，但经过理论的转换和改造，本土化的“民族国家”理论的产生则解决了人们对中国民族国家认识上的诸多困惑。

二、以“民族自信”精神继承民族文艺理论传统。文艺理论的失语源自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不自信，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轻视和否定。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更是产生了诸多值得继承的遗产。“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诸多文学批评范畴，它们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在诸如风骨、格调、文气、文笔、文心、风味、诗眼、诗格、体式、意境、趣味、虚实、曲直、通变、性灵、神韵、

立意等等范畴中,使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与批评具有了直觉性、形象性、含蓄性、暗示性等特征,呈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韵味。”“在中国古典神话中,常常出现的命意、用事、点化、句法、造语、体用、取境、越俗、体物、讽喻等术语的运用,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突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直观性、经验性的特点。”^⑩对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中的范畴、话语、概念、方法等,我们应当非常自信地加以继承、进行改造,赋予其当代意义。

三、在多元对话中,努力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当代概念与理论话语。东西方在文艺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设中,存在着重要的不同之处,西方往往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有所批判追求创新,东方更立足于继承传统借鉴域外,缺乏在批判前人基础上创造新的理论体系的努力。文学理论、批评方法都缘于文学创作实际,所有的概念、理论、术语都是为了解决当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都是手段,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努力解决文学创作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文学也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生态文学等就是新出现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研究应该以当代文艺实践为立足点,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展开多元对话,在对话中取长补短,努力创造当代概念与理论话语,在解决当代文学发展中的现象和问题时,不断完善与丰富这些概念与话语,从而促进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与发展。

注 释:

- ①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版,第951~952、523页。
- ③ 秦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 ④ 孙中山:1924《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版,第783页。
- ⑥ 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1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 ⑦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 ⑧ 邓正来主编:《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页。
- ⑨ 姜鹏:《民族主义与民族、民族国家——对欧洲现代民族主义的考察》,《欧洲》2000年第3期。
- ⑩ 陈永龄主编:《民族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页。
- ⑪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⑫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扩张史》,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上海版,第82页。
- ⑬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6页。
- ⑭⑫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6、23页。
- ⑮ 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 ①⑥ 宁骚：《论民族国家》，《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6期。
- ①⑦ 贾英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 ①⑧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1902年4月8日第5号。
- ①⑨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 ②⑩ 杨春时：《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新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 ②⑪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 ②⑫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1页。
- ②⑬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 ②⑭⑮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1~193、191页。
- ②⑯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 ②⑰ 李杨在《“救亡压倒启蒙”？》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书屋》2002年第5期。
- ②⑱ 张志忠：《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型》，《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
- ②⑲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
- ③⑰ 王本朝：《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到“战国策派”》，《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 ③⑲ 李永中：《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以〈新青年〉为中心》，《江汉论坛》2007年第1期。
- ③⑳ 王应平：《战国策派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时间》，《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
- ③㉑ 江倩：《对“家”的控诉与传统文化的解构——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文化取向》，《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 ③㉒ 李杨、洪子城：《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 ③㉓ 郑凡凡：《论民族国家想象和老舍文学创作》，《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 ③㉔ 孔苏颜：《九叶诗派与民族国家想象》，《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年专刊。
- ③㉕ 苑青松：《谈“反正”——对〈白鹿原〉中民族国家想象的思考》，《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 ③㉖ 刘艳：《个体生命审视与民族国家思考的双重表达——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理论学刊》2007年第5期。
- ④⑰ 刘传霞：《论民族国家与男性自我主体表达——析郁达夫小说的妓女叙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 ④⑱ 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 ④⑲ 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 ④⑳ 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 ④㉑ 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406页。
- ④㉒ 钱中文：《在夕阳的辉煌与新世纪的曙光之中》，《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 ④㉓ 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 ④㉔⑵ 杨剑龙：《论西方文艺中心论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 ④㉕ 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 ④㉖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7页。

[杨剑龙 陈海英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邮编 200234]